



电影·Moive

[美] 安特耶·阿舍得 著

柳迪善 丁宁 译



希特勒的女明星

纳粹电影中的明星身份和女性特质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希特勒的女明星

1933-1945年德国电影业与纳粹政权的关系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文联出版社

希特勒的女明星

HITLER'S HEROINES

纳粹电影中的明星身份和女性特质
STARDOM AND WOMANHOOD IN NAZI CINEMA

[美] 安特耶·阿舍得 著

柳迪澍 丁宁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特勒的女明星：纳粹电影中的明星身份和女性特质 /
(美) 阿舍得 (Ascheid, A.) 著; 柳迪善, 丁宁译. —上
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书名原文: Hitler's Heroines: Stardom and Womanhood in Nazi Cinema
ISBN 978-7-208-08630-2

I. 希… II. ①阿…②柳… ③丁… III. 女性—电影演员—
人物研究—德国 IV. K835.16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7091 号

策划统筹 贾超二
责任编辑 黄安乔
封扉设计 Arphy



希特勒的女明星：纳粹电影中的明星身份和女性特质
[美] 安特耶·阿舍得著 著
柳迪善 丁 宁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233,000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08630-2/J·147
定 价 32.00 元

序 言

本书表达的一些观点是我一生思考所得。最初接触第三帝国电影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一个天真无知的普通电视观众，熟悉的也只是由莎拉·莱安德（Zarah Leander）或莉莲·哈维（Lilian Harvey）主演的音乐片、巴斯比·伯克利（Busby Berkeley）导演的好莱坞电影、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和金杰·罗杰斯（Ginger Rogers）主演的音乐片，等等。由于德国配音技术水平的因素，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童年时所喜爱的那些电影杰作在相互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一类属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另一类则是纳粹阴暗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但是，我最初却认为纳粹电影与好莱坞电影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这个印象在我开始研究国家社会主义电影的时候得到了加强，并且引起了这个领域里很多学者的关注。

我最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电影是因为里面的女性角色，她们迷人的魅力与我以前和国家社会主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纳粹妇女强壮刻板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纽约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对性、类型、政治等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而且，在我研究的关于美国电影的书中，我经常感受到一种压力。的确，女性主义电影批评指出了女性角色在好莱坞主流

电影中的形象艰难改变的可能性，她们的一些观点我随后也运用在对国家社会主义电影的分析中。事实上，当我重新观看第三帝国的电影时，用以前作电影研究的一些方法来解读流行文化中女性的形象，往往可以得到卓有成效的结果。除此之外，在文化研究领域中提出的一些方法对我所进行的“纳粹文化中的电影明星”的研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我要感谢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给我的思维启示，它们给了本书极大的帮助。

本书最初是想作为我在纽约大学的论文来提交的，所以，在学校正式的课堂教学中以及与老师、朋友和熟人的谈话中所获得的收益都对本书中一些思想的成形作出了贡献。我要感谢柏林的德国电影资料库和邦德萨切夫博物馆，以及位于莱茵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电影博物馆，它们给我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如果没有这些资料，本书是无法与读者见面的。本书中出现的所有图片都得到了德国电影资料库的允许。感谢纽约大学的教授，尤其是我的导师罗伯特·斯科拉、科里斯·斯达尔和里查德·艾伦，谢谢他们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我还要感谢爱利克·兰特契勒，他给我提供了专业方面的知识和建议，并让我的这份研究成果得以出版发行。此外，我还要感谢杰德·杰曼德和琳达·斯古特·萨丝，他们投入大量的精力阅读了最初的书稿，给我提建议，并为我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书收入了两篇曾经发表过的文章：一篇名叫“纳粹的演员和摩登女郎：莉莲·哈维个案分析”，曾发表在《新德国评论》1998年春季和夏季刊上；另一篇是本书第四章的“莎拉·莱安德的多重面貌”，1999年冬季和春季刊的《电影评论》23卷上曾经发表其节选版。

此外，我还要对我的朋友和同事们说一声感谢，他们给予我长期无私的帮助，不倦地阅读我的书稿，对我的事业充满鼓励和无限的期许，这些都给我增添了无尽的信心，他们是杰夫·米勒、克里斯汀·哈斯、

亚里山大·凯勒、露西·波泽娜、嘉·南萨森、宛迪·罗兰德、波拉·马森德、罗艾·格兰德曼和克里斯汀·汤普森。

最后，我想对我的父母——吉斯娜和艾伯哈德·阿齐德说一声谢谢，他们与我愉快地讨论过关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激发了我对研究这个课题的兴趣，没有他们充满智慧的鼓励和坚持不懈的支持，我无法完成本书的写作以及我在学业上的追求。

目 录

序言 1

引言 1

第一章 纳粹文化？国家社会主义、明星身份及女性形象 13

 纳粹国家中的电影文化及其流行状况 13

 第三帝国的女性们 26

 纳粹明星和女性形象 36

第二章 克里斯蒂娜·泽德尔鲍姆：一个关于自然性与自我牺牲性的神话，“帝国的浮尸” 57

 “自然性”作为明星身份的特征 66

 天真，腐败，自杀：法西斯美德的女主角——

 克里斯蒂娜·泽德尔鲍姆 78

第三章 莉莲·哈维：国际明星、德国喜剧、梦幻组合 129

 “世界上最甜美的女孩子”是一位国际明星 140

喜剧女演员、舞者、甜心：莉莲·哈维扮演着德国	
“邻家女孩”	152
第四章 歌剧女主角、母亲、殉道者：莎拉·莱安德的多重面貌	200
莎拉·莱安德的明星形象：双重生活的画像	207
牺牲的女英雄？莎拉·莱安德的电影尝试	219
小调：富于女性激情的男性噪音	253
结语	271
参考书目	280
译名对照表	292

引言

1938 年，纳粹女性杂志《国家社会主义女性瞭望》（*NS-Frauenwarte*）发表了一篇社论，严厉地批评了当时在德国大众媒体上呈现出的女性形象（图 I.1）。这篇文章配有一系列的图片，以两页的篇幅举例说明了哪些形象应该从视线内消失，哪些应该用来代替这些被淘汰的形象。在左边，我们发现有一组衣着暴露的女性拼贴画，有合唱队的女孩，还有高贵的女爵士，她们浓妆艳抹，喝着香槟。而在右边，我们看到的是身穿针织运动服或是农民打扮的女孩子们，她们都有着迷人的金色头发，脸部没有经过任何的修饰，她们有的在锻炼身体，有的在跳着当地的舞蹈，每个人的轮廓都清晰可见。在左边，读者看到这样的粗体字：“你认为美丽而有趣味？我们却认为肮脏而令人难受。”而在右边我们则读到如下文字：“你认为单调？我们却认为健康而美丽。”这两组图片中间的文字评论说：

任何关注了最近一系列连续出版物的民众也许都惊奇地注意到了，一种鲜明的犹太风格正向我们袭来。我们可以看到，在电影或其他各种表演中，女性完全成为风流社会的一部分，对于婚姻和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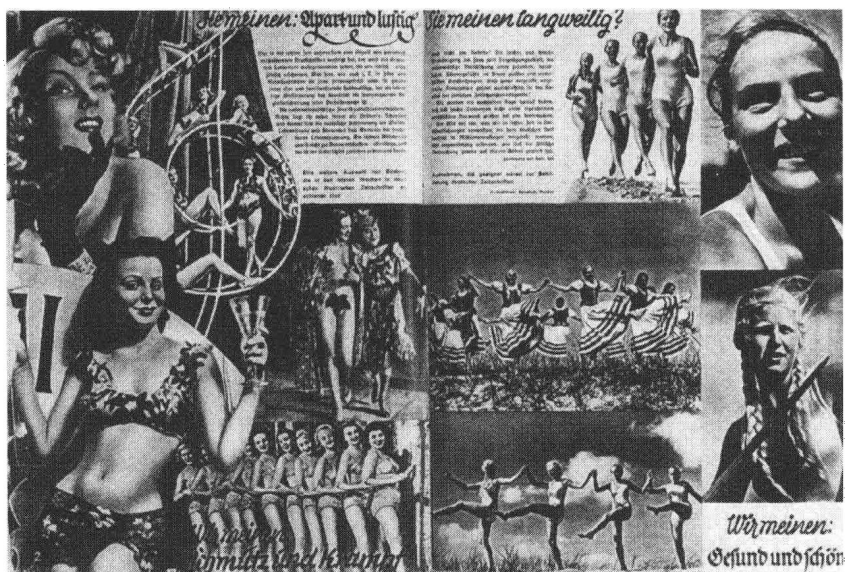


图 I.1 一边是在纳粹文化中仍然存在的、魏玛时期的光艳迷人的女性形象，一边是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理想的、具有自然美女性的形象，《国家社会主义女性瞭望》杂志将它们放在一起进行对比。

庭持敌视的态度；女性是没有生气的社会的化身，而这，正是之前的颓废时代的标记性符号。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理想是对生命的郑重肯定，这绝对不是假正经的行为。美丽和优雅是女性自然天性的追求，对生命的享受和感官的愉悦则是创造生命的动力。一个美丽的姑娘当然不会天生就是一个修女，但是，即使时代不同了，她也不会天生就是一个卖弄风情的女子。女性被降低为浅薄轻佻地供人娱乐的对象，将身体健康和自然美感用虚假做作的化妆变为了赤裸裸的对性的贪婪，所有这些被扭曲的、不自然的风潮完全都是因为犹太人制造的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的宣传所致。我们必须警觉地注意，这些潮流在一些借口下并没有再度出现。我们还要留心最近向千百万德国民众提供的出版物，它们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来自犹太人的污染已经严重地影响了这块特殊的领域。^[1]

这是一篇不同寻常的关于性别、性特征和种族的异文合并，它挑起了一系列的紧张对立关系，而这正是其目的所在。文章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并置在一起作为敌对的双方，而把其中的一方视为典型的反德国类型。整篇文章弥漫着各种各样的纳粹话语，比如围绕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女性的各种争论，以及大众媒体中呈现出的有关女性的冲突性形象：反犹太主义、反动的女权主义、性别理论、反宗教趋势、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的主张。作者请读者比较这两组女性图片。一组是现代性的抽象拼贴画，女性全部是半裸的穿着，与德国和美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很类似。这组抽象拼贴画的目的是为了激起民众对魏玛时代和当代外国文化的感觉，暗示了大众的堕落，尤其是女性作为玩物的对象化趋势。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对于法西斯主体部分的美学式的创造，阐明了其他关于纳粹民间传说的民意方面的整体性特征。

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是不可能弥合的。让我们看看这两页上的内容，我们很难喜欢右边的图画。实际上，文章的作者假设了一个会排斥右边图画的读者，他的欣赏口味需要调整和引导（“你认为单调吗？我们却认为健康而美丽”）。作者还痛苦地抱怨了德国的电影业和电影作品，认为当代德国电影没有重视刻画理想的家庭模式，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表现没有孩子的夫妻家庭模式上，这正好强调了私人的欲望而忽视了民族繁衍的工程。^[2]正如很多学者也注意到的那样，纳粹电影中表现的女性形象充满了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由于受到文化连贯性、经济依赖性和意识形态矛盾方面的影响，国家社会主义文化经常产生自我矛盾，因此，使得一些相持的紧张领域得到表达的机会，这正好说明了在纳粹意识形态中压制与反压制的道理。在公众人物和流行文本中流通的那些话语曾经责备女性形象和她们的愿望的多样性，而这一点又反过来清晰明白地说出了女性气质作为那个时期的一个持续对抗状态的攻击目标。

想像一下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无数的念头立刻充满我们的头脑。实际上，国家社会主义文化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对现代技术积极支持的态度，这些技术包括对新出现的媒介的充分利用和大量灭绝方式的有效开发。将有纪念意义的场面用管弦乐编曲的方式保存下来或者将电影的图像用做宣传的目的——这些我们可以在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新成立的致力于对观众的启蒙与宣传的宣传部里找到——这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思路是一致的。德国电影评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认为，可以将政治集会美学化为一种“大规模的装饰行动”。1934年，在纽伦堡的政党会议上出现了莱尼·里芬斯塔尔声名狼藉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用布莱希特·贝托尔特（Bertolt Brecht）的话来说，影片深刻地说明了纳粹是怎样表现“政治话语就是戏剧”。^[3]另一个当代的观察者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纳粹是想打破美学和真实生活之间的隔阂，然后让大众媒介为此服务。^[4]

我们也许会期望，纳粹统治下的电影应该不仅仅只是每周的新闻片和宣传片。基本上，受欢迎的电影文化的关键在于电影给观众提供了娱乐。这并不是说电影逃避了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战争电影或所谓的天才电影，表现出的故事情节都是壮丽化的、朝向胜利的男性争斗，并且鼓励观众认同这种法西斯的作品。这类影片与纳粹意识形态的内涵是一致的，它们最初是给德国的男性观看，影片充满对男性力量的幻想和对英雄之死的描写。在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女性的职责只是限制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然而，在流行的电影中，女性通常都是扮演中心角色。引人注目的一点是，纳粹电影是以女性明星为主，女性在电影银幕上是胜利了，然而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模范的女性”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日常生活中却经常受到压制。

尽管妇女在国家社会主义电影中的呈现都是在德国意识形态的框架

内发挥作用，服务目标都只是在这个体系中的有着同样愿望的观众，但妇女在这个范围内经常被描绘为“他者”的形象。^[5] 法西斯主义的文本，正如我早先引用的那些，都与女性气质、性感、和种族有关系，它们揭露了纳粹文化对于女性形象把握上的难点。具有煽动性的政治家所理想化的纯洁少女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母亲的保守形象已经不再能吸引和愉悦当代观众了，他们所喜欢的是有好莱坞魅力的大都市尤物型的危险女性形象。

然而，在研究纳粹文化中的女性时，对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各种不同女性形象的社会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历史学家企图将女性降低为受害者或者同谋的身份，而不是把她们当做“效忠希特勒的女人”，或者是在集中营听命于纳粹暴行的女士兵，她们的工作范围从一般性事务到有计划的天种和屠杀。而且，过去的历史学家根据纳粹的观点为普通妇女描绘了日常生活的内容。导致产生这些历史观点的原因清晰地说明了政治性遮蔽了大众文化中的各种冲突性话语，这些话语更加复杂，政治上更具有野心。这也就是说，甚至与纳粹提供的榜样相对立的女性形象也没有切实性的颠覆力量。相反，通过她们提供的“虚假性的、欺诈的形象”^[6]，她们实际上是帮助建立了法西斯的宣传事业。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认为资本主义体制（纳粹德国也是其中之一）经常创造这样一个政权制度：“它可以造就多样性，同时也可以导致一个独裁组织的诞生。”^[7] 同样的道理，凯瑟琳·加拉格尔（Catherine Gallagher）也指出：“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意识形态冲突的表现形式与压制性的社会关系的维持状态是相似的。”^[8] 根据这些概念，我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政府需要接纳它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借以满足并调和大众的幻想。纳粹德国的极权体制既不能以一种不变的意识形态方式向大众发号施令，也不能以此来容忍大众的话语。显然，女性角色是包含在这个问题之内的。戈培尔和他的

助手允许文化多样性的表达，因为现存的文化形式与纳粹德国的教条总是相冲突的，所以观众总是坚持表达他们自己的爱好。不应该将国家社会主义电影及其电影明星只认作为“大众文化”，女性（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包括男性）必须也被看做“广大观众”，她们的消费倾向造就了我们在本书中将要遇到的矛盾对立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电影文化是一种有活力的文化形式，它由一系列朝不同方向发展的关系构成，而不仅仅是从上到下的模式。而在此之前，帕特里克·佩特罗（Patrice Petro）对魏玛时期女性历史的考察说明了魏玛电影是如何向女性观众言说的，又是如何表现女性所关心的问题的。女性在其中被表现为“现代主义的他者形象”，她们被降低为大众文化的符号表征，而缺乏文化产生的重要性。^[9] 现代主义者的比喻是将大众媒体看成是产生阴性化文化的工具，并将从法西斯德国中产生的大众文化看做是流行的文化，它们包括所有大众文化的消极方面。因此，法西斯文化又被比喻为女性化的（通过将大众文化与女性身份联系起来）和男性化的（根据对男性地位超越性的意识形态上的赞美，和它的法西斯主义的现代性特征）。^[10] 从文化的高压到身体的迫害这个大范围来讲，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好像只是一个微弱的部分。

为了将女性定位于日常生活中，我希望能直接论述女性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从受欢迎的电影和相伴而生的女明星的话语中，考察这些女明星表现女性以及与女性交流的方式。国家社会主义文化用两种极端不同的方式来接近女性：第一，是刻画那些完全遵孩子、厨房、教堂/元首（Kinder, Küche, Führer）意识形态的女性；第二，是意识形态上有问题的人，她们推崇的是消费的生活方式、职业或社会地位方面的提升、浪漫爱情的满足（这些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国家集体为中心的），所有这些都通过电影和女性明星表达出来。就像佩特罗和米莲姆·汉森（Miriam Hansen）所认为的那样，电影从最初就为女

性观众提供了很多东西。^[11] 实际上，女性大量的文化消费导致了这两方面的文化评论朝着男性至上主义的方向合并。现代人的二元概念认为女性总是文化消费中的低等元素，而男性文化消费总是高等的，这最终导致了法西斯大众文化中值得质疑的成分都是女性化的成分。^[12] 其实，这个争论的根本问题在于：女性大量卷入了大众文化消费中，并将女性自身和她们与国家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展现在了最显著的位置上。

这一点反过来说明了女性明星作为显著“路标”的重要地位，因为她们传递给了女性自身的身份认同感，并展现了女性的梦想及渴望被认同的愿望。在过去，女性电影评论考察纳粹电影的主要中心是，流行影片中女性的形象是怎么通过角色呈现出来的。这让我得以扩大文本阅读和理论路径的范围，并且可以引入对明星制度和文化研究的考察。我早先提到，典型的乌发电影公司（Universum-Film Aktiengesellschaft，简称UFA）就成功地创造了以女性角色为主角的电影，并成为纳粹电影的主要组成部分。^[13] 正是通过女性形象和女性电影明星的传统，才使得女性气质能够在德国纳粹文化的范围内取得自己的显要地位。尽管纳粹文化能够把它的政界人物——尤其是其中的暴君头领阿道夫·希特勒——统一在男性明星文化中，但清晰可见的女性形象（并非普通的类型人物），如乌发电影公司的女明星们，她们中的很多人甚至都不是德国人。

从原则上说，纳粹主义既不喜欢致命的女性也不喜欢脆弱的女性，而且也不赞成现代文化中的新女性。它将“德国母亲”和被去除了色情形象的女性战士和斗士放在了绝对显著的地位。相应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媒体有时通过明星来表现他们对女性理想形象的概念，这些明星既可以是电影中的也可以是其他流行文艺形式中的。然而，纳粹电影总是把女演员的银幕角色和明星形象描绘成努力体现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精神的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她们又涉及存在于国际电影和魏玛时期的话

语。尽管纳粹文化的明星和电影展示了受到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痕迹，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是否它们的流行就只是因为这些影响呢？不仅不同的电影制作人和乌发电影公司用极其不同的方式来刻画女性明星，而且，不管他们是怎么做的，女性形象都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她们在纳粹法西斯极权统治下，自身与外部关系的潜在摩擦和冲突。与纳粹主义所期望的相反，它的流行文化不可能成为惟一的文化，它必须允许一系列与此不相融合的另类声音共存。

正如其他学者也注意到的，仔细考察纳粹电影可以发现，这种文化产品也与纳粹意识形态的规定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而且，我们同样发现，尽管不是很显著，但在好莱坞的产品中所表现出的散漫的、多样性的特征也可以在这里找到。戈培尔对法西斯总体文化产品的宏大设想——将德国作为一件艺术品来看待——使我们再次陷入了一个矛盾的情景中，这个体制试图包容它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张力，而不是去解决它们。^[14]

我没有从考察纳粹主义的文化操作模式和它的文化产品这方面来说明纳粹文化是如何产生出来的——也就是通过文化分析来解释德国法西斯主义——我想考察的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规定之下，其文化的不稳定性是如何发生的。尽管考察这个政体的宣传过程呈现出的特殊角色是很有用的，但这样一种聚焦方式会导致明显的公式般的分析，只会再重复产生意识形态规定的结果，而忽视了其中隐含的深层的文化现象。

我的分析内容是错综复杂的，主要围绕与她们分散不连贯的历史方面的各种相互交错的话语，和从中显示出的女性气质。在国家社会主义文化中显示出的各种力量——意识形态和文化产品的经常的分裂——为解释第三帝国体制的含义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因此，我不仅仅感兴趣于将女性的呈现方式放在纳粹主义的文本中进行考察，而且，我还感兴趣于在国家社会主义规定之下的女性表象的文化描述和评价。因为她